

JINDAIWAIGUORENZAIHUAJIANZHUYICUNDE
YICHANHUAYANJIU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 遗产化研究

季国良·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 遗产化研究

季国良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遗产化本质上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包括个人、家庭(家族)、群体(族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情感、记忆的内化过程,也包括当代政府等公权组织的“制造”“生产”遗产过程。本书主要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问题,即研究其怎样由外国建筑文化、外国人的建筑转变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的遗产。这主要是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并将这个历史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70年代末和1970年代末以后,重点是最后一个阶段,遗产化的实质进行并取得显著进展也是在这个时期。本书在最后还是试图从遗存的历史因素、认同的理论基础和认同途径三方面破解外来建筑遗存遗产化的难题。

本书适合近代中国建筑、遗产学领域的研究者与学生阅读参考,也适合对相关问题有兴趣的社会人士阅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在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遗产化方面遇到思想困惑的实际工作部门或人士也应当可以从本书得到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遗产化研究 / 季国良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41-6424-9

I. ①近… II. ①季… III. ①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中国 IV. ①TU-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3652 号

书 名: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遗产化研究

著 者: 季国良

责任编辑: 宋华莉

编辑邮箱: 52145104@qq.com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424-9

定 价: 48.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前 言

人类历史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他者”遗存问题,猎奇、转化为自己的财富,陈列矮化以抬高自己或身份区别,摧毁,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处置方式。18世纪以来发展出了一种以尊重、认同为特征的遗产化方式。但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使遗产化面临着文化差异、意识形态、情感等方面的阻隔,特别是“二战”以后,殖民者留下的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成为各国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遗产化本质上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包括个人、家庭(家族)、群体(族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情感、记忆的内化过程,也包括当代政府等公权组织的“制造”“生产”遗产过程。前者形成一种“私义”上的遗产,后者则往往是(不总是)将“私义”遗产公共资源化,转化为“公义”遗产。两个过程在对客观对象的认同上统一起来,这种认同既有对客体对象的科学、艺术、历史等内在属性的承认、认可、赞同,也有对其情感、经济、区隔等附加价值的钟情和利用。

本书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问题的,即其怎样由外国建筑文化、外国人的建筑转变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的遗产的。这项研究成果本是本人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是崔大庸教授。该论文于2012年11月开题,2015年5月如期完成。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建议尽快出版,本人也有这个迫切愿望,于是有了现在这本书。

本书进行的主要是一项历史研究,并将这个历史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70年代末和1970年代末以后,重点是最后一个阶段,遗产化的实质进行并取得显著进展也是在这个时期。主体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六章)。

第二章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本书研究了外国宗教组织、官方势力和工商侨民三个外国人主体的建筑活动,这样研究既反映了主体的多样性,又揭示了建筑类型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同时也在研究中也注意交代建筑活动的区域范围。这些为下文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先是阐明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必须遗产化的命题,这个必然性命题是基于对这些遗存特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揭示国人1949年对外来建筑接受、认同的转折。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外来建筑及其文化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但这个接受是有限的,一是因为殖民半殖民环境使人们对外来建筑的许多方面

仍有疑惧,二是因为对本民族建筑文化仍有令其复兴的民族情结。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处于“反帝”“革命”的话语之下,对外国人建筑遗存基本上不存在尊重意义上的遗产化,大量的是原始功能式粗放利用,在“文革”中还存在着“破四旧”意义上的排斥破坏。但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渐渐积累起对这些建筑遗存的情感联系。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政府主导和社会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研究1970年代末以后遗存的遗产化问题。第四章研究的政府主导下的遗产化主要是对其进行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保护包括制度性保护、保护措施制定、具体保护行为及保护性再利用。政府的保护是基于对遗存各方面价值的尊重和认可,也含有经济和建设的取向。“申遗”是将这些遗存作为文化资本进一步“公共化”,也可以看作是更大范围上的遗产化。第五章研究社会思想意识上遗存所得到的认同。一是社会上对遗存的话语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将外来建筑遗存在华出现、存在看作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和产物,这种话语体现在学术阐释模式上,也体现在实践中的遗产阐释上;交流融合话语是对外来建筑遗存的一种认同协调;当然,不同的话语也还是存在的。二是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社会进而将其作为一种符号资本,争相予以猎取和利用,出现了一种“符号崇拜”。三是在大众意识中,由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人们对其有了不同的情感联结。

第六章是对前几章的一个总结和深化,也试图破解外来建筑遗存遗产化的难题。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在时空上和建造过程中存在诸多中国因素,这是其遗产化的有利方面。人类共同遗产观念、历史间离效应和建筑现象学是有助于阐释外国人建筑遗存必然遗产化的理论基础。而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既是对数十年来国人认同途径的总结,又是外来建筑遗存最终获得遗产化的路径指向。

通过以上研究,本书在学术理论上解决了创造者离开后属地如何将其遗存遗产化问题,丰富了遗产社会学内容;实践上为国人对大量现存近代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认同提供历史、认识、理论和路径等方面的经验和思想资源,为今后外来建筑遗存的遗产化提供借鉴和学术指导。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他文化”遗存与遗产化问题	1
第二节	对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相关学术研究	5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研究意义、路径	9
第二章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活动	16
第一节	外国宗教组织在华建筑活动	17
第二节	外来官方势力在华建筑活动	37
第三节	外来工商侨民在华建筑活动	50
第三章	1949 年外来建筑认同问题的转折	66
第一节	遗产化: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必然命题	66
第二节	1949 年以前对外来建筑的有限接受	75
第三节	1949 年后外国人建筑遗存认同问题转折	84
第四章	保护、申遗:政府主导下的遗产化	98
第一节	走出“文革”与外国人建筑遗存遗产化	98
第二节	外来建筑纳入制度保护	103
第三节	政府主导下的保护性再利用	112
第四节	进入申报世界遗产的视野	120
第五章	社会思想意识与遗产化	125
第一节	交流融合话语与认同协调	125
第二节	价值认可与符号崇拜	134
第三节	情感联结:大众的认同意识	146

第六章 外国人建筑遗存遗产化难题的破解	152
第一节 外来建筑遗存特性再认识	152
第二节 遗产化的理论可能	163
第三节 对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认同途径	173
结语	180
参考文献	184
附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	200
后记	20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他文化”遗存与遗产化问题

“‘他文化’遗存”是立足本位对境内外来者、他者(自己则可能是后来的)遗留物的称谓,而这个“外来者”或“他者”已经离去或已发生文化质变。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作进一步理解。

一方面是从文化本体角度来说的。“他文化”可能意味着与本位文化的巨大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宗教本体的差异,如相对于伊斯兰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这种情况下去说“‘他文化’遗存”,往往是该地出现过文化转型,如佛教文化地区或基督教文化地区的伊斯兰化(比较典型的是北非、中东、中亚地区),从伊斯兰文化角度看,佛教遗存或基督教遗留物可被看做“‘他文化’遗存”。

另一方面,在当代语言中,“‘他文化’遗存”也可能意味着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遗留物。在这种语境下,该地可能遭受过他国或他民族的入侵、殖民统治;也可能是该地出现过大规模民族迁徙,使其民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本书对“‘他文化’遗存”列出这两个方面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事实情况可能更复杂。对这两方面遗存如何认识以及怎样处置,是人类曾经甚至现在都需要面对的重要文化问题,其间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

一、人类历史发展与“他文化”之物

对“他文化”遗存的“认同”事实上是当代遗产运动^①语境下出现的说法,也就是将其“遗产化”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对“他文化”态度往往很简单,有时候很粗暴,甚至因此造成新的“遗存”。

^① 本书指的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1964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以来的世界遗产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首先面对“他文化”之物的往往是在征服战争或反抗战争之中,而这个战争征服在许多情况下又是以民族(族群、种族),或者是“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其间经常伴随着屠杀毁灭的喧嚣,“他者”的东西有的不复存在,有的成为废墟。随着战争结束,地域人群主体的变化(有的没多大变化),对“他者”的东西,或者基本摧毁,利用其材料建起“自己”的新物,或者简单地适用性改造利用,或者任其废弃。需要指出的是,在激烈的战争之外,由于人们改造能力的局限,许多“他者”之物,长期留存成为与新主体相伴的“遗存”;有的长期湮没,许多年甚至许多世纪之后,重新被发现,成为“新”的需要面对的“遗存”。

在古代,对“他文化”之物也许有掠夺,据为己有,但多出于金钱目的,或是简单的好奇审美。并“没有任何原则用来阻止对古代建筑物及艺术品的破坏”,即使保存下来,也“没有被赋予一种历史价值”^①。

15世纪晚期开始的殖民主义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他文化”之物的新记忆。殖民主义,特别是早期殖民主义(19世纪中期以前),是卑劣的、野蛮的,甚至是血腥的,并充满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偏见。其武力征服活动也往往伴随着对“他文化”的摧毁。如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文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摧毁阿兹特克古国的首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令人回想起过去或者让人想恢复往昔辉煌年代的建筑遗迹”^②。在今天秘鲁东南部的库斯科,是13世纪至16世纪南美洲印加文化的中心,印加帝国的都城,也是一座黄金城。1532年,西班牙人闯进库斯科,掠夺黄金,血洗城池,把库斯科宏伟建筑付之一炬。300多年后,中国北京圆明园先后罹难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战火中,他们不仅掠走大量珍贵文物,还焚烧建筑。一些跟着殖民主义而来的传教士,还利用不平等条约,摧毁中国当地的庙宇等建筑,建起“他们”的教堂。典型的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三岔河口的皇帝行宫被改建为法国领事馆,崇禧观则被拆除,原地建起了望海楼教堂,甚至炫耀地称为“圣母得胜堂”。

与殖民主义兴起几乎同步的还有西方学术界的變化。这也影响了对“他文化”之物的态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学者重视对古物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遗物进行研究。17世纪至18世纪,美学、考古学学科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对“他文化”之物的系统研究。而学者们的步伐则走向了整个世界,“他文化”之物成为他们重要的猎取目标。如曾宣称“将古代希腊迁到英格兰”的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从希腊掠走了相当

① [法]弗朗索瓦丝·萧伊.建筑遗产的寓意[M].寇庆民,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3.

② [英]罗伯特·贝文.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M].魏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1.

数量的古代文物^①。中国敦煌和新疆地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是被这样的学者掠夺的重灾区。英籍匈牙利学者马·奥·斯坦因(M. A. Stein)等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走大量经卷文物,德国学者勒柯克(Le Coq)等探险家将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克孜尔石窟等地的壁画用狐尾锯割走,运回德国博物馆收藏,并声称这样最安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壁画相当一部分消失于“二战”战火中。

二、当代世界对“他文化”遗存的遗产化

“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传统殖民主义终结,主权国家更多审视的是自己境内的文化遗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兴起的遗产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许多国家把境内“‘他文化’遗存”也进行遗产化,予以认同。这单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层面也可以看出来。

一些国家将古代文明甚至宗教本体不同的文化遗址申报成了世界遗产。在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的许多遗址如蒂亚瓦纳科、科潘、前文提到的库斯科等已经被一些国家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东、北非地区,现在是伊斯兰教信仰地区,历史上曾是多种文明的发祥地,经历多个帝国的统治,这里的金字塔、波斯波利斯、帕尔米拉、迦太基古城、泰尔、哈图沙等古代文明和帝国的遗址被埃及、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等国申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有的遗址所体现的宗教文化内涵是与当代伊斯兰教文化有严重冲突的,但 these 国家将其遗产化了,埃及甚至还申报了具有纯宗教色彩的阿布辛拜勒神庙^②和属基督教文化的圣凯瑟琳修道院^③。

当然也有极端相反的事件。典型的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保证伊斯兰信仰纯正性的名义炸掉了世界最高立佛——巴米扬大佛;但是塔利班政权之前阿富汗政府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将其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只是因为国家动荡,后来没有签署批准书);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新的阿富汗政府还是积极对巴米扬山谷的佛教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修复。

与上相比,一些国家将 16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者的遗存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更值得我们玩味。戈雷岛(Goree Island),非洲最西端国家塞内加尔的一个以奴隶贸易著名的岛屿,于 1978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也许这是对殖民主义的谴责。但更多

①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 建筑保护史[M]. 郭旗,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1:69.

② 阿布辛拜勒神庙(也有学者译作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修建的伟大建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坝致使水位威胁到神庙,埃及政府尽力抢救但认为自己力量不足,于是向国际社会求助,于是出现了国际社会抢救阿布辛拜勒神庙的“阿布辛拜勒运动”,这个运动极大推动了当代世界遗产运动。李清. 神庙大挪移——拯救阿布·辛拜勒行动与世界遗产保护[J]. 世界博览,2007(7):50-55.

③ 圣凯瑟琳修道院 2002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彭龄,章谊. 圣凯瑟琳修道院[J]. 世界博览,1999(1):26-27.

的国家是将殖民主义者遗存作为“好的”、有价值的正遗产予以申报的。美洲加拿大魁北克城历史区、秘鲁利马历史中心、巴拿马历史地区、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巴西的萨尔瓦多历史中心等历史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遗存皆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许我们会说这些国家的语言、民族仍与法、西、葡密切相连,这些遗存的“他者”意味还不是很浓。那么,在亚洲,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遗存的菲律宾巴洛克教堂群和维干古城、印度果阿教堂和修道院、斯里兰卡加勒古城则是地道的“他者”,它们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印度后来还将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终点站等英国殖民者的工业遗存申报世界遗产。近两年来,殖民遗存申遗势头不减,如肯尼亚蒙巴萨的耶稣堡(2011年)、科特迪瓦大巴萨姆的历史城镇(2012年)、太平洋岛国斐济的莱武卡(2013年)等都成功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三、当前中国对境内他者遗存认同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就中国古代而言,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他文化’遗存”。虽然佛教是外来宗教,但已经充分中国化,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因而中国人对境内佛教遗存从没有“见外”过,而且多处佛教遗存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如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承德外八庙、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五台山等。

真正给中国人带来认同困难的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留下的遗存。而近十几年来围绕其“申遗”所展开的讨论突出体现了对其认同的困难性。

目前,中国澳门历史城区在“申遗”中突出其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共存互融的文化价值,已于2005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申遗”的动作。2003年和2012年,上海先后有政协委员两次向相关部门提出将外滩作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进行“申遗”的动议。2006年,厦门开始有动议将鼓浪屿进行“申遗”,2009年正式启动“申遗”工作,2012年进入了国家文物局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申遗”工作中,强调鼓浪屿在历史上曾是公共租界,突出其作为“国际化居住型公共社区”的价值^①。2010年,青岛市政协会议上出现“申遗”提案,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个报告:《关于我市德式建筑为主题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②。2012年,武汉市首次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申遗”主题为“近代文化转型遗址”,涵盖汉口原租界区、汉阳工业遗产区和武昌首义遗产区三大部分^③。云南省则酝酿与越南、法国合作,将当年法国主持修筑的滇越铁路进行申遗^④。综

① 海鹰,姚凡.鼓浪屿申遗打“宜居”牌:上世纪就是国际居住区[N].厦门日报,2011-07-27.

② 姜珊.中西交融特色鲜明 青岛老建筑群拟申请世遗[N].青岛财经日报,2010-04-13.

③ 夏琼.武汉首次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EB/OL].新华网湖北频道,2012-10-24. http://www.hb.xinhuanet.com/2012-10/24/c_113476510.htm.

④ 施阳.滇越铁路申遗期待中越法跨国合作[N].昆明日报,2013-04-30(7).

上所述,澳门、上海、厦门、青岛、武汉和云南所进行的“申遗”工作都与近代“‘他文化’遗存”有关,有的甚至俨然将其作为主题。

对于这些城市的“申遗”,真正引起大讨论的是2003年,当年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在上海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交议案,建议外滩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北京的《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上海的报刊《解放日报》《外滩画报》等展开了辩论,这些文章也不不断地被转载,特别是在网络上被激烈地讨论。2012年旧事重提的时候,还有争议,但不像2003年那样枪来弹往,也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对于这场争论的主要内容,一些媒体进行了总结,《上海采风》杂志的一篇文章用几个标题进行了概括:“是自揭伤疤还是弘扬人类文化”;“是欧洲建筑的山寨版还是罕见的文化宝库”;“外滩是否需要申遗”^①。

但这些争论中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是“外滩是谁的遗产”,这也是实质性问题。《中国青年报》晏扬的文章强调“外滩建筑群是殖民者们留下的历史‘杰作’”“是一种殖民文化”^②;《工人日报》则说它是“殖民色彩浓重的玩意儿”^③。《解放日报》承认上海外滩“来自异域”^④,赵丽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殖民者设计的”^⑤。但上海的媒介和学者认为如果只是这样看就太狭隘了,还应把它看做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⑥，“应该站在一个大的视角，即人类的文化角度”^⑦。“谁的遗产？”是问题的核心，也正是本书关注的问题。

第二节 对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相关学术研究

一、对遗存本身的相关研究

目前对外国人在华建筑文化遗产(为表述方便,后文有时写作“外来建筑遗存”“外国遗存”)的历史研究主要夹杂在对近代中国城市史、建筑史的研究中,从通论著作来看,杨秉德早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⑧列专章分别研究了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哈尔滨、长春等殖民色彩较浓的城市及其建筑;后来湖北教育出版

①⑦ 胡凌虹. “外滩申遗”的争议与深意[J]. 上海采风, 2012(6): 4-12.

② 晏扬. 外滩建筑群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遗产[N]. 中国青年报, 2003-07-02.

③ 一刀. 外滩申遗, 要想想历史[N]. 工人日报, 2003-07-08.

④⑥ 王多. 上海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惹了谁? [N]. 解放日报, 2003-07-23.

⑤ 杨雄. 上海外滩“申遗”: 公然自揭“伤疤” 弘扬“殖民文化”? [EB/OL]. 千龙网, 2003-07-03. <http://www.qianlong.com/3413/2003-7-3/225@931730.htm>.

⑧ 杨秉德. 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社出版的李百浩、郭建著《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①，刘先觉著《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②和杨秉德著《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③也多有涉及。就对地方城市史、建筑史的研究而言，成就颇丰，比较重要的有伍江著《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钱宗灏等著《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④、张复合著《北京近代建筑史》^⑤、李乾朗著《台湾建筑史》^⑥、董黎著《岭南近代教会建筑》^⑦、童乔慧著《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研究》^⑧、吴尧等著《拼合记忆：澳门历史建筑的发展与保护》^⑨、黄棣才著《图说香港历史建筑：1897—1919》^⑩、荆其敏等编著《天津的建筑文化》^⑪、宋连威著《青岛城市老建筑》^⑫、王丽著《鞍山近代建筑》^⑬、欧阳怀龙和谢玲超主编《从桃花源到夏都——庐山近代建筑文化景观》^⑭、李南著《莫干山——一个近代避暑地的兴起》^⑮，博士论文如《青岛近代别墅建筑及其环境艺术研究》（王福云，南京林业大学，2007）、《长春近代城市建筑文化》（刘威，吉林大学，2012）、《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邢荣发，暨南大学，2005），这些研究中多有对外国人在华建筑状况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在清华大学张复合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至今已出版9册）中也有不少关于外国人在华建筑史和建筑遗存的研究论文。

也有专门对外国在华城市史、建筑史进行研究的著作。王方的《“外滩源”研究——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⑯分三部分分别研究了“外滩源”^⑰街区的起源与结构、早期（1843—1911）“外滩源”建筑和摩登时代

① 李百浩，郭建.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② 刘先觉.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③ 杨秉德.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④ 钱宗灏，等. 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⑤ 张复合. 北京近代建筑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⑥ 李乾朗. 台湾建筑史[M]. 胡先福，改编.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⑦ 董黎. 岭南近代教会建筑[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⑧ 童乔慧. 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⑨ 吴尧，[葡]樊飞豪，[日]是永美树. 拼合记忆：澳门历史建筑的发展与保护[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⑩ 黄棣才. 图说香港历史建筑：1897—1919[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

⑪ 荆其敏，荆浩. 天津的建筑文化[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⑫ 宋连威. 青岛城市老建筑[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

⑬ 王丽. 鞍山近代建筑[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

⑭ 欧阳怀龙，谢玲超. 从桃花源到夏都：庐山近代建筑文化景观[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⑮ 李南. 莫干山：一个近代避暑地的兴起[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⑯ 王方. “外滩源”研究：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⑰ 外滩源：上海外滩起源的地方，指黄浦江（南岸）和苏州河（东岸）交汇处。

(1912—1937)的“外滩源”建筑。陈雳的《楔入与涵化——德租时期青岛城市建筑》^①研究德国强租青岛时期,青岛城市的形成和建筑风格、类型及其影响。谭伊孝著《北京东交民巷》^②研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形成和历史发展与收回。但这种研究不多。此外,也有相关专题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黎对教会大学建筑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③一书中,作者从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了教会大学的建筑风格,并对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的建筑进行了重点研究。也有学者开辟出新的研究角度,如王瑜的博士论文《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2)从传播学角度将1840—1949年作为一个重点,研究该阶段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的途径、特征与影响,以及岭南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互动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学者^④出于该国在华曾经有过城市建设的经历,研究了一些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史,如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Torsten Warner)著有《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文化移植》^⑤《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⑥,日本学者越泽明著有《哈尔滨的城市规划1898—1945》^⑦《伪满洲国首都规划》^⑧等。除了著作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外国人在华建筑历史和遗存的文章,此不赘述。以上这些相关历史研究对于笔者摸清外国人在华遗存的分布、建设思想、建筑风格有重要意义。

对于外国人在华建筑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研究也多夹杂在近代遗产利用研究中,上面提到的张复合主编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和其他著作都或多或少有所论述或提及。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刘庆所著《青岛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⑨,该著作分别从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整个老城区三个方面对青岛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进行研究;刘敏的博士论文《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价值评价与文化生态保护更新》(重庆大学,2004)运用价值评价论与文化生态保护论,开展对青岛旧城整体风貌、核心区、滨海区、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空间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探索有效而切实的城市文化生态保护更新途径。青岛的德国、日本遗存较多,因而

① 陈雳. 楔入与涵化:德租时期青岛城市建筑[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② 谭孝伊. 北京东交民巷[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③ 董黎.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④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学者在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参与了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近代建筑普查和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众多有关日本近代在华建筑活动的成果,西泽泰彦是其代表人物,他对日本在东北的建筑活动多有研究。

⑤ [德]Torsten Warner. 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文化移植[M]. 柏林:Ernst & Sohn,1994.

⑥ [德]托尔斯藤·华纳. 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M].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⑦ [日]越泽明. 哈尔滨的城市规划1898—1945[M]. 东京:总和社,1988.

⑧ [日]越泽明. 伪满洲国首都规划[M]. 欧硕,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⑨ 刘庆. 青岛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

与本书选题有较大关系。再者就是侯鑫的著作《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①设有专章研究了天津、青岛、大连的外来城市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外国人在华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有许多专著多夹杂在近代建筑遗产研究中进行,对某城市的近代遗产研究多(也有几个相关省的近代建筑研究),却没有对全国进行研究的,相关专题研究除了董黎的教会建筑研究有专著外,其余研究尚且难见。

二、对遗存认识的相关研究

在对近代建筑文化遗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认识角度,比较突出的是后殖民角度。对于西式建筑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有的学者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强调其在中国本土化过程,强调中国人的认同选择作用,代表文章如陈伯超的《中国近代建筑的中国观——以沈阳近代建筑为例》^②。这种认识角度的出现,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者对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后殖民理论影响的结果。这从禹永万等人对近代大连的研究也可以体现出来,他们从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霍米·巴巴(Homi Bhabha)^③的理论出发,认为近代大连是个“为了再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模仿都市”,但是支配者在对其文化进行移植的时候也付出了“文化混杂性的代价”^④。后殖民角度也反映在对待外国在华所建建筑的利用的认识上。李东晔研究了天津意式风情区建设,认为经过“去殖民化”努力,这个原来的租界变成了“一种美的、高级的、时尚的、现代的西方主义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认同”,作者也依 Homi Bhabha 的理论,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化过程所创造的“文化杂交性的第三空间”^⑤。而对于类似的大连俄式风情街的复原建设,禹永万等人则认为,虽然其主要目的是“搞活被遗弃的旧都心和保护有历史价值的重要建筑物”,但是其“本质上就是模仿,为俄罗斯观光客再现上世纪都市片段”,其结果“有转化为新殖民地的忧虑”^⑥。

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产认识和遗产化的角度研究了外来建筑遗存。张复合教授批评了长春有的地方模仿伪满建筑的行为,他区分了历史遗产和历史文化遗产两

① 侯鑫. 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② 陈伯超. 中国近代建筑的中国观——以沈阳近代建筑为例[J]. 建筑学报,2006(6):43-45.

③ Homi Bhabha(1949—),霍米·巴巴,印度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代表作有《文化的定位》等。

④⑥ 禹永万,[韩]张益洙,李东培. 大连在后殖民地过程中呈现的关于相对立都市造型的研究——以 Homi Bhabha 理论为中心[M]//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85,85-86.

⑤ 李东晔. 从“租界”到“风情区”:一个中国近代殖民空间在历史现实中的转义[D]. 中央民族大学,2007:90.

种概念,认为伪满洲国的城市遗产只适合作为历史遗产予以保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将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看待,也就不能延续其文脉^①。王艳平先生将那些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称为“殖民建筑”,著文讨论了它的文化性和能否申报世界遗产的问题,认为其“文化遗产性部分决定于社会价值取向”,作为“公共物品”若利用恰当能够发挥其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等正外部性,可以从“代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角度,将其作为“负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②。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了滇越铁路的遗产化问题。滇越铁路是法国主持修筑的铁路,李春霞、彭兆荣在研究“遗产化”问题的时候以其为例,认为滇越铁路正处于遗产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滇越铁路正经历一个“被打造”的历史^③。吴兴帜的《延伸的地平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④研究了滇越铁路的物质生命史,其重点是研究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的发展关系,其中也研究了滇越铁路与边民的自我延伸问题,其实质是滇越铁路的遗产化问题。

以上这些学者的观点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外国人遗存在中国的遗产化问题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由“他者”遗存到“自我”遗产的路径以及全局性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研究意义、路径

一、遗产化概念

遗产化是本书的关键概念。对于“遗产化”,目前学术界中有三位学者给出定义,吴兴帜认为:“遗产化过程就是一个从‘私义的遗产’向‘公义的遗产’转变的过程。‘私义的遗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公义的遗产’则是存在于公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品质的集合和主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是遗产主体的‘上移’以及遗产主体的多元化。”^⑤李春霞认为:“遗产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认定、评估和管理的过程,而现代的所谓“遗产”事实上都不过是机制化的遗产,是人为性的、审美性的、选择性的、策略性的和操作化的结果。”^⑥赵红梅

① 张复合. 长春历史文化研究与紫线划定[M]//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五).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146.

② 王艳平. 关于对殖民建筑遗产性的教学讨论[J]. 旅游学刊,2005(S1):118-120.

③⑥ 李春霞,彭兆荣. 从滇越铁路看遗产的“遗产化”[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9-34.

④⑤ 吴兴帜. 延伸的地平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认为,“遗产化”是遗产的“制造”,是“当代的遗产生产”,是遗产的“产业化”,是一个“认知、解释、记忆、选择、切除、遮蔽、认同、主观、规划、制造”的过程,是一种“当下求助于过去的文化生产模式”,也认为“现代遗产,不过是人为性、审美性、选择性、策略性和操作化的结果”^①。

这三位都是人类学学者^②,从吴兴帜、李春霞的论文或著作来看,其共同点是,都认为遗产是一个由政府等公权组织主导的“生产”过程。对于这个“过程”,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认识基础,就是认为遗产就其原属性而言“都与过去(先辈、先祖)留下来的东西有关,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宗教的、习俗的、认知的、知识的和技能的”^③,或者说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的财物和权利”^④;而现代遗产则有一个从“私权”到“公权”,从“私义”到“公义”^⑤的演变过程^⑥,这些都是彭氏一派的基本观点。但是将“遗产化”定义为政府等公权组织的“制造”明显存在着悖论,即遗产在政府“制造”之前就已经存在,吴兴帜定义的“遗产化”明显存在着这个问题;而李春霞在文章中承认遗产的“私义”,虽然在定义遗产化的时候,将其认定为“资源”(而不是“私义”遗产)的认定、评估和管理过程,但这个“资源”事实上也是包括“私义”上的遗产的。就赵红梅文章所定义的“遗产化”来看,似乎没有明确遗产“制造”的主体,但其文章认为“遗产化”存在着一个“命名”的仪式,这是一个身份转换的“类阈限”过程,其结果是获得“遗产的第二轮生命”,由此可见,赵红梅的定义也是以彭氏一派遗产的“私义”与“公义”为基础的,也默认“遗产化”的主导是政府等公权组织,其定义也存在着吴兴帜和李春霞观点中的悖论^⑦。

由此可见,判断一个“遗存”物是不是遗产,就不能只停留在政府或其他“公权”组织的“制造”上,还应有一个无论对“私义”还是“公义”都适应的判断方式,笔者认

① 赵红梅.论遗产的生产与再生产[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9-34.

② 三位都是彭兆荣先生的学生。彭兆荣(1956—),著名人类学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旅游人类学和遗产人类学是其主要研究领域。

③ 李春霞,彭兆荣.从滇越铁路看遗产的“遗产化”[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9-34.

④ 彭兆荣,葛荣玲.遗事物语: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8-65.

⑤ 遗产“私权”、“私义”是从个人、家族、族群甚至地方层面来说的,认为遗产是属于这些主体的,他们对其拥有所属权及责任和义务;而“公权”、“公义”则是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来说的,国家和政府将其“公共化”。

⑥ 彭兆荣.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8.

⑦ 当然本书在这里并不是所有“存在物”或者说“遗存”、“资源”都是“遗产”,遗产从“私义”上说,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对有些人来说不是,也可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在现实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许多遗存与世隔绝很长时间,甚至许多世纪,在新发现之后就被政府等公权组织遗产化,而并没有经历过当代“私义”上的遗产化。